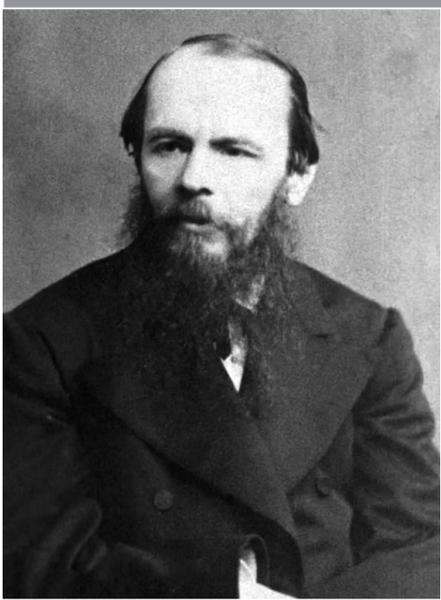


经典

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人学家

□万海松



伟大的俄国作家、思想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虽然早已在俄国文化的复兴时期亦称白银时代(1890—1917)开端之前的三十年就已经去世,但是可以说,在思想史上他直接促成了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的繁荣,特别是其中研究人及其本性的宗教文化或宗教哲学。故而,有一种说法认为,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恰恰构成了俄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39年8月16日给哥哥的信中表示,他自己通过阅读与写作在完成着既认识自己也破解社会之谜的同构任务:

“我对自己有信心。人是一个秘密。应该解开它,如果你一生都在破解这个秘密,那也别说你在浪费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这说明“成为一个人”和研究“人成其为人”的秘密,既是一个作家或思想家毕生的事业,也是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思想和“人学主义”的关键所在。

“人学”与“人学主义”

白银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精神导师。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关于人的启示》一文中,对比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提出了“人学家”这一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学家,人性、人性的深度和秘密的研究者。他的全部创作——都是人学的体验与实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位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艺术家,而是一位实验家、一位人性本质的经验形而上学的创立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艺术,无非是人学探索和发现的手段。”别尔嘉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学研究的推崇,其理由是: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任何人都从未有过那样一种对人的主题的绝对关注。而且,谁也没有这样的天才去揭示人性本质的秘密”。

那么,“人学”或“人学主义”这个词,与现有的汉语词汇中为大家熟知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有何区别呢?概而言之,人学研究虽包括人道主义研究,并在价值观意义上对人道主义加以某种肯定,但两者毕竟不同:人学研究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门学科,而人道主义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关系的一种评价,是一种价值观;人学包括人道主义,但不归结为人道主义。根据俄国哲学家谢尔盖·霍鲁日的看法,当今的学术界所要建立的人学,就是希望通过对人的完整科学理解来克服抽象人道主义对人加以片面错误理解的局限。众所周知,humanism这个词在汉语里至少有三种译法——“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中文语境里,后两种译法有时候又可以用作别的指代:“人本主义”有时也用来“人学主义”,“人道主义”有时也用于翻译人道主义行为和思想。另外,“人文主义”更多地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彰显人性的文学艺术精神。

如果说,我们习惯于用humanism来指在现当代思潮里那些把人看作一个既定且完整的统一体,进而阐述关于人的道德伦理、政治经济以及权利义务的思想理论。比如,法国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就在《非人:漫谈时间》这本书里追问对于humanism来说最根本、最不应该被忽略的问题:何为人?人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该书中译者夏小燕就认为,用“人道主义”作为humanism的译名,可以体现出利奥塔探究“人之道”,亦即人之性或者人之本体的初衷。那么,我们就此可以看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语境中,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人学”和“人学主义”,在人的定义的否定面(即“非人(inhuman)”)上,与现当代的人道主义(humanism)思想具有较多的通约之处,因为利奥塔在谈论humanism时,往往隐含着一些思想预设,如:人道主义意义上所说的人是否存在以窘迫的方式变成“非人(1'inhumain)”?人之“本”是否就意味着在人身上住着“非人”?由此不难发现,“非人”的影子不同程度地存活在陀氏笔下的瓦尔科夫斯基、拉斯柯尔尼科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宗教大法官以及荒唐人等人物形象身上。

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万·卡拉马佐夫之口对三弟阿辽沙说出了人之容纳万物、无所不包的本质:“不,人是宽广的,甚至是过于宽广,我恨不得要把他弄狭窄些。鬼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是的!理智上认为可耻,心里却以为很美。所多玛城里有什么?请相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美确实存在于所多玛城里,——你知道这个秘密吗?让人痛心的是:美不仅是可怕的,还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东西。魔鬼跟上帝在搏斗,而战场就是人的内心。”人的本质,特别是良善等品质,完全需要借助于展现“非人”的过程才能形象地表现出来,而这或许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学”和“人学主义”的文学形态,也可以视为他独特的人学辩证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辩证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主义思想,既是对他之前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思和回应,又是对他之后的发展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呼唤和期盼,它既包含启蒙运动

以来欧洲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想传统的因素,也有俄国东正教的影响和他自己赋予人学主义思想的新内容。其人学主义思想就实质而言是一种独特的人学(hominology)或人学主义精神(anthropologism),亦即对待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完整的人和作为具有多面性的人性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思想经历了从推崇小人物到批判人神再到辩证看待凡人的过程,但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信、望、爱始终是其民族主义情绪和普世主义情绪的内在本质和原始动力。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东正教人道主义思想所凸出的若干悖论,既反映出他渴望用宗教来解决道德问题的理想,也彰显了其无法单独克服的人道主义的危机。

关注人的命运就是关注人的自由的问题。别尔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注重考察处于自由之中的人的命运,自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核心。而人学主义研究人的前提,就是认为人的个性具有绝对的意义和价值。而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无法穷尽人及人性悲剧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人自身具有的复杂性、多面性、矛盾性或辩证性。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主义对发展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补充和独到贡献。也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认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尼采一样都经历了新旧人道主义两个时期,前者所继承的俄罗斯文学的旧人道主义传统,是指“俄罗斯对所有被欺侮、被欺侮和堕落的人的同情”,即“俄罗斯的仁慈之心的价值观”,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克服了旧人道主义天真、肤浅的原则,他揭示了一种完全崭新的悲剧的人道主义。在这一方面,只有尼采可以和他相比。在尼采那里,旧的欧洲人道主义结束了,人的悲剧性问题被以新的方式提出。人们已经多次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了尼采的思想。两个人都宣告了关于人的新发现,都首先是伟大的人学家,他们的人学都是启示录式的,指向极限、终点和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人和尼采关于超人所讲的,都是关于人的启示录思想。”而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之所以完全不能囊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之洞察的深度,不管是唯物主义者人道主义还是基督教人道主义,因为这些人道主义思想过于自满和乐观。在现实生活中,人性的现实面更多地体现出悲剧性,“其中包含着比人道主义意识所能想象的要巨大得多、要多得多的矛盾”。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继承者的别尔嘉耶夫,甚至预见到了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悲剧,这主要是指人在丧失理想主义后的精神悲剧。

人学的辩证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东正教思想的精神,它是逐渐形成的:起始于《地下室手记》,完成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否定人在本质上是追逐利益、追求幸福、寻求满足的,否定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在人身上隐藏着的是对为所欲为的需求,对无限的、高于一切幸福的自由的需求”。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人——是一个非理性的动物”。恰如《地下室手记》所宣示的:“我们”最主要和最珍贵的东西,亦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辩证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主义思想,既是对他之前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思和回应,又是对他之后的发展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呼唤和期盼,它既包含启蒙运动

普鲁斯特:真正的生活,是文学

□曹丹红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有许多经典段落与名句,不仅被专业评论者反复谈论,也被很多普通读者竞相传抄。例如《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重现的时光》中就有一句读者津津乐道的名句:真正的生活,是文学。根据译林出版社出版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重现的时光》,完整的原话是:“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见天日的生活,从而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这也就是文学。这种生活就某种意义而言同样地每时每刻地存在于艺术家和每个人的身上。”根据这段话,文学不仅是“真正的生活”,而且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

然而,这句话的真实性却遭到一些读者的质疑。2013年9月11日,一位名叫爱德华·罗内的人在法国《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传票”的文章。文章标题玩了一个十分巧妙的文字游戏,因为传票 citation à comparaître 的三个单词如果逐字翻译就是“被传唤出庭的引文”。有些引文要被传唤出庭以便证实自己的真伪,这便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作者有次听到某位作家提及伍尔夫的一句话:事情只有被写下来才算真正发生(Nothing has really happened until it has been described)。这令他联想到普鲁斯特那句有关“真正的生活是文学”的名言。两句话如此相似,导致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考证一下两位意识流大师究竟谁影响了谁。结果是,首先,他没有在伍尔夫的作品或日记中找到她的那句话,随后,关于普鲁斯特那句话,作者“在一个旧版本的《重现的时光》中寻找了一下……然而并没有找到”,应该说他找到了一个高度相似的句子,该句子参照译林版《重现的时光》翻译一下就是“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见天日的生活,从而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某种意义而言,同样地每时每刻地存在于艺术家和每个人的身上”,两相对照,这个句子里缺少的恰恰是“这也就是文学”这一部分。

幸好这并非作者最后的结论,因为他随后也指出,广为流传的那句话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但“它(根据我的藏书)直到1970年代才在一个Folio版本中出现”。无论如何,这并不影响作者的结论:作者想借这两个著名的例子,来质疑很多广为流传的名人名言是否都有据可依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发人深省,因为现实生活中,查无此话的情况确实时有发生。比如,“诗就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这句同样流传广泛的名言,它被认为是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说,之后成为很多反诗歌翻译派的有力证据。

回到普鲁斯特,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生

活……是文学”这句话并非如《解放报》文章作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可疑的引文,因为我们可以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4年三卷本以及1987—1989年四卷本中的《重现的时光》里看到它。但这样一个重要的句子,的确是经过了一番波折,才得以进入《重现的时光》中,其原因主要在于《重现的时光》的底本问题。据研究,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动笔写《追忆似水年华》(下称《追忆》),很快就完成了初稿的撰写,至少有理由相信在一战结束时,《重现的时光》的初稿已完成,因为1918年出版的《在少女们身旁》一卷里附的出版计划中已能看到《重现的时光》这个书名。尽管如此,普鲁斯特一直对自己的手稿反复修改,不愿草率付梓,在1922年去世时,只出版了《追忆》的前几卷,包括自费出版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1913年),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1918年),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的前半部分(1920年),《盖尔芒特家那边》的后半部分和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一)(1921年),《索多姆和戈摩尔》(二)(1922年)。剩下三卷《女囚》《消失的阿尔贝蒂娜》(译林版为《女逃亡者》)《重现的时光》分别出版于1923年、1925年、1927年,那时普鲁斯特已经辞世。

普鲁斯特去世后,他弟弟罗贝尔·普鲁斯特在时任《新法兰西杂志》总编辑助理的让·波朗协助下出版了《追忆》剩下的几卷。普鲁斯特在写作时有一个习惯:他先在笔记本上写草稿,随后请人用打字机打出。在他去世时,《女囚》和《消失的阿尔贝蒂娜》虽未出版,但经他审定的打字机稿已完成,而《重现的时光》只有手稿。普鲁斯特去世后,罗贝尔·普鲁斯特负责将手稿打出,对于手稿中无法辨认的部分,打字机稿只能以空白取代。这份打字机稿成为1927年《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出版的二卷本《重现的时光》的底稿。在1927年的这个版本中,对于上文讨论的那个句子,我们看到的原文正是《解放报》文章作者提到的版本,也就是缺少了“这也就是文学”这一部分,而这位作者所说的“旧版本”很可能就是这个版本。这一版《重现的时光》之后成为其他出版社所出版版本的依据,甚至在今天还广为流传,笔者拥有的多个电子版《重现的时光》即依

据这个底本确立,在阅读之初给笔者带来了不小的困惑。

而“真正的生活……是文学”见于1954年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重编的《追忆似水年华》。主编之一皮埃尔·克拉拉克提到,这一版本的《追忆》是根据普鲁斯特侄女芒特-普鲁斯特夫人提供的普鲁斯特手稿和校样编订的,是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底本。从《重现的时光》来说,根据打字机稿编订的1927年版除了缺漏外,还有另外的问题:编者为了与已出版的几卷保持内容上的连贯性,对打字机稿内容进行了剪切和调整,使其偏离了手稿的原貌。此外,《重现的时光》的初稿很可能在1913年前就已完成,至作者去世前,这本书的修改持续了7年多的时间,是全书删改最多、最不完整的部分,这也加大了出版工作的难度,导致最后出版的书中有不少不连贯甚至前后矛盾之处。皮埃尔·克拉拉克和安德烈·费雷在根据手稿编订《重现的时光》时,强调他们“既没有改变不同事件的前后顺序,也没有修改书中的矛盾之处”,因为他们“想要保留一部伟大作品未完成的一面”,伟大作品的未完成性,这一近乎矛盾的组合作者看来具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克拉拉克与费雷编订的七星文库三卷本《追忆似水年华》在1954年出版,是伽利玛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之后出版的多个版本的底本,这也是为什么《解放报》文章作者会在1970年代的某个版本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是文学”这个句子。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全译本在其版权页中注明是根据伽利玛出版社1984年版本译出,应为1984年版七星文库《追忆》全集,沿用的是1954年克拉拉克与费雷版本。这一版本在1980年代末被七星文库推出的四卷本《追忆似水年华》(1987—1989)取代,新版由普鲁斯特研究专家、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塔迪埃总编,仍然依据手稿编订,这一版本在很多方面比1954年的版本更为忠实普鲁斯特本人在书稿中



标注的各种指示,因而可以说更接近原貌,或许也更为符合普鲁斯特的本意。

无论如何,这两个版本都保留了“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见天日的生活,从而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这也就是文学”这句话。通过手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句话应是修改时添加的一个长片段的开头,从译林版(2012年版)来看,就是第七卷第197页“真正的生活”至198页“发送它们特有的光芒”,中文字数总计约五百字。普鲁斯特将这个长片段写在正文边缘,同时以符号标明了要插入到初稿的位置。

抛开考据,无论普鲁斯特最初意图如何,这句话应该说与《追忆似水年华》的主题非常契合。《追忆》从表面看是对逝去时光的追忆,但也可以认为这是一部有关写作的书,《重现的时光》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一部小说。叙述者马塞尔一直怀疑自己是否有写作天赋,直到他偶然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写作之路,打消了多年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这个令马塞尔感受到“至福”的事件在《重现的时光》中得到叙述。事件本身非常平淡:多年以后,马塞尔去盖尔芒特亲王参加下午茶会,在亲王府邸门口,为给一辆电车让道,仓



普鲁斯特

促之间踩到了高低不平的石块,脚下凹凸不平的感觉令他突然想起曾在威尼斯圣马克圣洗堂踩到两块高低不平的石板的历史。马塞尔在那个瞬间认识到,生命之中的两个时刻可以因某种相似的感觉突然联通,而通过仔细品味这种熟悉感将过往召回,通过对现时的体验令过去的时光重现,这便是写作的任务、对象与方法。

这种方法,普鲁斯特也称之为“翻译”:过往的珍贵记忆随时光流逝变成朦胧的印象,从我们的日常记忆中消散,但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被时间埋藏;写作能够令这些记忆重新浮现,因此写作就像是用语言将“内心印象”翻译出来的过程。在写作中,我们重新经历了曾经历的生活,而且以一种更为纯粹的方式。因此马塞尔说,“真正的艺术……其伟大便在于重新找到、重新把握现实,在于使我们认识这个离我们的所见闻远远的现实,也随着我们用取代它的世俗认识变得越来厚,越来越不可渗透,而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个现实。”如此看来,“真正的生活……是文学”这句话其实凝聚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精华,正如普鲁斯特主张文学不是技巧问题,而是视觉问题,“真正的生活,是文学”这句话式的表达是这位伟大的文学家为读者提供的一种看世界的新“视觉”,读者透过对它的领悟,更新了认识现实、把握现实的方式,因此从读者角度说,这句话实在有充分的理由出现于《追忆似水年华》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